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职业性别隔离研究

张 娜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重庆 401520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探讨了职业性别隔离在汉语中的表现与测量问题。重点评述了新的语言指数 GO，该指数通过测量职业中性别标记词的使用情况，以此预测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揭示了职业性别隔离与时间、语言体裁和地区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其结果推动了职业性别隔离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反映出了汉语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职业性别隔离、语言指数、影响因素

DOI:10.12417/3041-0630.26.04.081

1 引言

“职业性别隔离”最早是由 Gross (1986) 在《职业性别结构的变迁》中提出，指劳动者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类别，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1]。职业性别隔离的存在不仅仅是两性在职业选择上的分化，也是一种滞后的社会语言文化问题。汉语在语法上是一种无性别之分的语言，但是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听到“女人的工作”“男人的工作”这种说法。这不仅是职业性别隔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很有可能带有特定的性别文化偏见，如“男博士”“男保姆”等汉语中出现的“性别+职业”的特定构式。这种说法因语言的性别类型而固定化，从而影响了男性与女性的职业抱负、求职机会以及他们在组织内的待遇和晋升。

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三所高校的团队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对职业性别隔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在《职业性别隔离与无性别语言中的性别语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变化与影响》（以下简称《隔离》）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语言指数 GO，建立了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与汉语这种无性别语言之间的联系。GO 等式的建立以及文本分析方法的使用为职业性别隔离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2 RIASEC 模型与 GO 等式的建立

《隔离》一文中使用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创建了一种新的文本分析方法，以此对性别隔离做出预测。根据霍兰德代码，将 63 种职业分为 6 种职业类型，即技能型 (R)、研究型 (I)、艺术型 (A)、社会型 (S)、经营型 (E)、事务型 (C)，其首字母通常用 RIASEC 来表示。基于 RIASEC 模型，文中采用简单便利抽样法选取了 244 名被试 (151 名男性, 93 名女性)，被试在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群体之间保持平衡。随后调查了被试对这 63 种职业所存在的职业“刻板印象”（即性别认知与职业类型之间的匹配情况）。该研究所使用的问卷 Cronbach's

alpha(克隆巴赫系数)的检测值大于 0.9，表明该问卷的信度较高。其调查结果是基于 Likert scale 5-point(李克特 5 点量表)所得出的结论。被试的任务是决定每个职业更适合男性 (1 分)、女性 (5 分)、中间值 (3 分)。不同被试群体对职业刻板印象的认知没有显著差异。

《隔离》一文中提出了一种测量职业性别隔离程度的方程（等式 1）。

$$DGS = K \times \frac{aTF_m^v}{TF_m + TF_f} + b \quad (1)$$

基于语言学中的标记性理论，将职业术语前使用性别标记符“男”“女”作为关键指数。等式 (1) 中 TF_m 是带男性标记的职业术语的频率（如男医生）； TF_f 是带女性标记的职业术语的频率（如女医生）。等式 (1) 中， K 和 b 是缩放的参数。为了便于和问卷结果比较，文中把参数 K 和 b 设置为 4 和 1。 a 和 v 代表导致职业术语前性别化语言使用的外部因素。例如，社会中的整体性别分布；职业或行业间的垂直隔离^[4]。这些外部因素应分别测量，且在本研究中设置为 1，该等式在此参数的设置之下可以进一步描述为：

$$GO = 4 \times \frac{T_f}{TF_m + TF_f} + 1 \quad (2)$$

该指数显示了带女性标记的职业术语的频率与总性别标记频率的比例。如果某种职业不存在性别隔离，GO 值等于 3；如果一份职业是男性或者女性主导，GO 值大于 3 或小于 3。该指数通过确认职业性别占主导地位的程度作为衡量职业隔离水平维度的标准。利用等式 (2)，文中计算出了 BCC 语料库中多个领域文本的 GO 值。根据皮尔逊相关性进行分析，问卷调查结果和等式 2 计算出来的结果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从而证实了 GO 值可以作为测量语言使用中体现性别概念性的职业隔离的有效量化指标。

3 基于语言指数 GO 的职业性别隔离研究

根据语言指数 GO,《隔离》一文中对《人民日报》语料库(1946-2018)历时72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性别化语言使用总趋势略有下降,总体水平保持稳定,但表现出逐年波动。这些数据的波动与当时特定时间段的社会、经济和话语的转变有关。例如,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GO值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一过程中,国家对劳动力的分配设置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使女性开始走向工作岗位。城镇妇女在国家、工厂或者企业中从事带薪劳动,农村妇女在人民公社的劳动部门工作^[5]。

《隔离》一文中计算出了 BCC 语料库中文学、报纸、微博和科技文本体裁中的职业性别标记的 GO 值和均值。结果显示:性别标记值最低的是微博,最高的是文学,科技和报纸居中。在语言学中,保守主义的语言或变体在历史上发展变化相对较少,或是一种相对抵制变化的形式或者变体。人们注意到,书面语体裁的变化比口语慢^[6]。

《隔离》一文中计算出了中国31个地区报刊(不包括香港、台湾和澳门)的 GO 值。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性别隔离相对较低的省份通常有大量的省际移民流动和丰富的文化融合。以黑龙江为例,19世纪下半叶经历的“闯关东”是清代以来历史上最大的跨省移民活动,也是著名的历史事件^[7]。1995年,随着国家“开发北大荒”政策的支持,黑龙江再一次迎来了一股有影响力的移民潮。在1995年至1974年间,黑龙江的跨省移民比例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最高^[8]。改革开放后,国内移民大量涌进沿海城市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移民流动加快了不同地域间文化与语言的碰撞与融合。一些学者认为移民流动引起的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导致了创新^[9]。语言创新程度越高,GO 值越低。性别隔离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于偏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文化特色鲜明,这些地区的语言文化表现出较强的保守性,从而产生较高的 GO 值。

4 小结

目前国内用于测量职业性别隔离的方法主要来自西方的统计描述法和指数方法,例如 IP 指数和关联指数。依据的研究理论主要是经济学范畴的“理性选择”和“统计歧视”理论;社会学中的“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女权主义学者用“父权制”对此做出解释;社会网络研究者基于社会网络提出了“社会网”理论^[10]。尽管这些理论对于解释职业性别隔离与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是研究者在测量职业性别隔离时仍面临着困扰。例如,职业相对规模和不同性别劳动者的相对规模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水平隔离和相对隔离很难独立分开;职业类别和层级关系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1]。《隔离》

一文中利用 GO 等式测量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有效避免了以上因素干扰。通过简化的 a 和 v, GO 值仍可以显示职业性别隔离程度的变化趋势。

GO 等式建立起了职业性别隔离与性别化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打破了国内对职业性别隔离这一现象的传统分析。这种文本分析方法利用覆盖广泛的数据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全面研究,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性别隔离和性别化语言在一定时期和区域内的发展变化以及影响职业性别隔离和性别化语言使用的相互作用的因素。GO 等式揭示了职业性别隔离和社会变化、语言保守性、语言体裁和地域之间的关系。从而表明基于数据分析的数字人文学科的方法可以应用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变化的研究中。

5 思考

《隔离》一文在探讨职业性别隔离的历时研究时,使用1946-2018年《人民日报》语料库中的数据计算出了 GO 值,从而判断出职业性别隔离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有减弱的趋势。但是,一些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得出了不同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状况研究》一文中利用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和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出了1982年、1990年、1995年和2000年的 D 指数。结果表明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程度总体较改革开放前呈现加重的趋势^[12]。《中国职业性别隔离趋势:1982-2010》一文中使用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详尽统一的职业分类系统对职业性别隔离变化趋势以及原因进行了探索。该研究发现,职业性别隔离程度自1982年至今持续上升^[13]。《社会变迁与职业的性别不平等》一文中调查了7个省和11个城市的数据,对1985年的49种职业,1993年的51种职业和2000年的44种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Blackburn 的边缘匹配方法,用 Q 系数表示关系的大小,以此来计算当年的程度隔离指数,结论表明职业性别隔离程度正在提高^[1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一文中采用 D 指数统计指标对1982年、1990年、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以73种职业为基础来预测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性别隔离程度的变化^[10]。结论表明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有所下降。这与《隔离》一文中所得的结论大致相同。

《隔离》一文在探讨职业性别化语言的使用与文本体裁的关系时,没有指明选取的这些文本体裁是否处于同一个时期。因为不同时期的文本体裁在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性别化语言的使用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在探讨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与区域的相关关系时,得出移民流动和文化融合地区的 GO 值较低;文化鲜明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偏远地区的 GO 值较高的结论。但是《社会变迁与职业的性别不平等》一文中指

出职业的性别隔离基本上不受区域差别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不同的分析方法、测量指数、不同年份的数据等因素都会影响职业性别隔离程度的测量。这些不同的

结论也可表明：国内职业性别隔离的相关研究还未形成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应在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该研究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 [1] 童梅.职业性别隔离问题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2(03):135-140.
- [2] Blackburn,R.M,Brooks,B.,&Jarman,J.(2001)The vertical dimension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Vol.15, No.3,pp.511-538.
- [3] Wang,C.H.(1999).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ir perceptions and ideologies among political cadres.Collection of Women' s Studies,Vol.14, No.2,pp.17-20.
- [4] Fromkin,V.,Rodman,R.,Hyams,N.M.(2010).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9th ed).Cengage Learning.
- [5] Lu,Y.(1987).A brief history of the immigration from Shandong to the northeast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6] Liang,Z,White,M.J.(1996).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1950-1988.Demography Vol.33,No.3,pp.375-384.
- [7] Meaning,P.(2005).Migration in word history.Routledge,London.
- [8] 李春玲.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变化趋势[J].江苏社会科学,2009(03):403-423.
- [9] 赵瑞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状况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4(04)58-60.
- [10] 李汪洋,谢宇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趋势:1982-2010[J].社会,2015,35(06):153-177.
- [11] 蔡禾,吴小平.社会变迁与职业的性别不平等[J].管理世界,2002(09):71-77.